

張蔭麟的通史理論與實踐—— 以《中國上古史綱》為例

— 張妙娟 —

摘要

近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是清末民初新史學觀點的提出。自從一九〇二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新史學〉一文以來，新史學的名詞正式出現，此後隨著時局的變化和新史料的出土等因素的影響，新史學不斷增添新內涵，除了批判舊史的體例與內容之外，更致力於建構新史觀、撰寫新的歷史著作。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平民文學帶動了歷史知識走向實用化、通俗化，許多教科書與歷史讀物紛紛應時而出。

張蔭麟是繼梁啟超之後耕耘新史學的眾多傑出研究者之一，雖然他論及新史學的作品「總數不過十篇，全長亦不過十萬言」，但仍被推崇是「承任公遺緒最有機會為新史學樹更佳楷模」的人，可見他在新史學思潮發展的脈絡中有其重要地位。本文先從清末民初新史學思潮的形成背景談起，接著分析張蔭麟對新通史的觀點與撰寫原則，最後進一步分析他的主要通史教科書——《中國上古史綱》的內容，藉以了解張蔭麟

在整個新史學思潮發展脈絡中所受之影響，並由此檢驗編寫歷史教科書時他自己在通史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

綜觀言之，從外部分析來看，《中國上古史綱》在主題的選定分配上反映了新史學思潮以來的撰述趨勢，並且巧妙地融入新異性標準，實效性標準與文化價值標準，亦即打破以帝王將相中心的狹隘格局，擴展歷史及於「國民全部的經歷」，包括宗教、文化、學術、經濟等範圍。從內部分析來看《中國上古史綱》具有幾項特色：以商代為上古開端，採用專節專章特寫歷史人物，擅長用語體文說故事的方式來敘述，文詞流暢優美，夾敘夾議。但是另一方面，對照作者自己所定之理想目標，《中國上古史綱》仍有其美中不足之處。例如對信史以前之文化、民族起源問題略而不談；經濟史的討論太貧乏以致對社會經濟史的注意不足；引用原始資料的篇幅仍然不少，部份描述往往失之冗長繁雜等。

總之，《中國上古史綱》所呈現的體例內容大多切合張蔭麟自己所揭示的通史撰寫原則，也充份反映了新史學思潮對他的影響，他的努力實踐理論是明顯可見的。雖然在撰寫通史的實際成就與他自己標舉的鵠的之間仍然存在一段距離，但是張蔭麟至少已在新史學的領域中樹立了身體力行、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示範。

關鍵詞：張蔭麟，中國上古史綱，新史學，通史理論

壹、前言

近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是清末民初新史學觀點的提出，自從 1902 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新史學〉一文以來，新史學的名詞正式出現，中國史學界也開始激起陣陣連漪。梁啟超的觀點不論是對傳統史學的批判(例如四蔽二病三惡果)，或是企圖建立一套新的史學研究方法(例如國民史)，都引發許多史學研究者熱烈的回應。有人因此稱梁啟超所標榜的新史觀「確是中國史學界的『颶風』，『火山大噴火』，與『大地震』。」(註 1)此後隨著民國肇建，時局變化，新史料的出土等因素的影響，新史學不斷增添新內涵，新史學風格的著作也日益豐富，甚至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也都反映了此一思潮，新史學的發展至今仍有方興未艾之趨勢。

張蔭麟是在梁啟超之後繼起耕耘新史學的眾多傑出研究者之一，可惜的是由於英年早逝，史學著述的成果遠不及其同時代的其他前輩與學者。他論及有關新史學的作品，「總數不過十篇，全長亦不過十萬言。」(註 2)儘管如此，許冠三先生仍推崇他是「承任公遺緒最有機會為新史學樹更佳楷模」的人。(註 3)汪榮祖先生亦認為「梁氏之影響雖大，而誠能光大其學者實寡，東莞張蔭麟或其人也。」(註 4)由此可見，張蔭麟少量的著作中仍有其可觀之處，究竟他的史學觀點有何特色？在新史學發展脈絡中他的角色如何？他之所以受推崇的原因何在？

有關張蔭麟史學理論的研究比起對其他新史學人物的研究要少得

註 1 此三詞原為梁啟超對康有為所著書的形容詞，周予同借用以形容梁啟超，見〈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錄於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 394。

註 2 許冠三，《新史學史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頁 57。

註 3 同前註，頁 6。

註 4 汪榮祖，〈梁啟超新史學試論〉，收錄於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 964。

多。筆者所見主要有方豪先生〈略論張蔭麟先生史學上之成就〉，林麗月先生之〈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黎華趙先生的碩士論文〈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許冠三先生《新史學九十年》一書中的第二章〈張蔭麟——既是科學亦是藝術〉，大陸方面有李洪岩先生〈歷史學也是一門藝術——評張蔭麟的一個史學觀點〉，〈論張蔭麟及其新史學〉，李埏先生的〈張蔭麟先生傳〉。此外尚有一些張蔭麟的故舊親友所寫的懷思短文，其中追憶張蔭麟之事蹟或理想亦可補研究論著之不足。對於張蔭麟生平及其史學之研究，黎華趙的《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以下簡稱《張蔭麟研究》)堪稱較完整之論述。其書共分三編：上編考定張氏生平事蹟，分兩章敘述其求學與教學、研究概況；中編編作年表，並分析《中國上古史綱》(註5)出版的經過；下編則就張蔭麟史學理論與通史方法論及各研究範圍之成績加以論述。就整體架構與內容言，《張蔭麟研究》內容以對張氏生平事蹟的追蹤連貫以及對其著作的分類目錄整理最為詳盡，長表多達十個，並加上統計數字的分析。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對張蔭麟生平中的重要著作《中國上古史綱》一書的內容未能作具體分析，評價也只剩一小段的讚譽文詞，實屬可惜。

上述的研究著作大多只針對張蔭麟的史學理論做系統化的整理與討論，但對其新史學觀點的淵源(即新史學形成的時代背景與發展脈絡)卻少有著墨，因而無法突顯張蔭麟在新史學思潮中的歷史角色與地位。此外，對張蔭麟唯一成書的未完成著作《中國上古史綱》也缺少詳細的內容分析。其實，經世功用是新史學的重點之一，為了讓史學研究能有助

註5 民國三十年《中國史綱，第一冊》正式出版，書名為張蔭麟自題，民國三十七年正中書局再版時加入第九、十、十一章，書名改為《中國史綱，上古篇》，民國四十一年張其昀檢得〈中國史綱獻詞〉，〈中國史綱自序〉兩篇置於書首，〈漢帝國的興盛與衰亡〉一篇列於書後成為第十二章，並將書名改為《中國上古史綱》，以示自成段落。以上版本沿革見宋晞〈中國上古史綱校後記〉，收錄於《中國史學論集》，(台北：臺灣開明書店，民國六十三年)，頁273-274。目前通行的多為張其昀編的《中國上古史綱》版本，本文因此選用《中國上古史綱》為代表書名。

於培養國民意識，不能不注意歷史知識的普及，而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就是直接呈現史學研究成果與教育目的的工作。大多數的史學研究者專注於探討理論，卻往往無暇身體力行去從事歷史的教育與編寫通俗實用的書籍，以致徒有理想，卻未能實踐其經世新民的目標。梁啟超在新史學理論上多有創見，從 1901 年就「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主義之發達。」（註 6）他的〈中國通史敘論〉一文便是這部通史的敘論部份，他還擬定了「中國通史目錄」，但終其一生卻未完成一部完整的、可供國民閱讀之歷史。張蔭麟的《中國上古史綱》雖是未完成作品，其初版序言長達五千字，表達了他對通史方法論的看法與精義，並且把他對通史的理念具體應用並呈現在這本教科書的編撰中。本文擬以上述的研究論著為基礎，嘗試分析新史學思潮對張蔭麟史學觀點的影響，並進一步分析《中國上古史綱》的內容，藉以了解張蔭麟在整個新史學思潮發展脈絡中所受之影響，也藉此評估他在編寫歷史教科書時他在通史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

貳、清末民初新史學的形成

史學發展與時代變遷的關係極為密切，沈剛伯曾說：「世變愈急，即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註 7）中國史學傳統悠久綿長，自孔子為「撥亂反正」而作春秋，司馬遷在秦漢一統之世撰寫史記，魏晉南北朝的動盪與種族融合促成史學著作的體例更新、撰著數量之豐富，直到唐代開館修史，宋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清代的考證校勘之學，無一不是反映史家對時代變遷與歷史發展的省思與回應。清末民初新史學思潮之興起亦不例外。

註 6 轉引自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 184。

註 7 沈剛伯，〈史學與世變〉，收錄於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頁 1110。

鴉片戰爭以後的半個世紀，西方列強挾其優勢的軍事、政治力量對中國展開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政治上清廷疲於應付戰敗殘局，國權屢喪；經濟上人民生計飽受資本主義不平等的競爭壓力；學術文化上，西學的輸入開拓了知識份子的視野，也顛覆了承襲已久的舊學傳統。處在這樣敵強我弱，人勝我敗的「千年未有之變局」，社會進化論因此受到最多青睞。在優勝劣敗的現實中，加上對物競天擇的焦慮，當時知識份子共通的體認與作法就是批判過去傳統的不足，力求重建未來的優勢，清朝末年幾次的變法圖強就是在此背景下推動的。就史學界而言，反省過去成果的闕陋，冀求建立符合新變局且能指導國民，達到資治境界的史學觀點亦是時勢所趨。

對中國傳統史學的不滿早在戊戌變法前已有零星的討論，1896年梁啟超的〈變法通議·論譯書〉中就提到「中國之史，長於言事，西國之史，長於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謂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鄉教養之所起，謂之民史。」(註8)1897年的〈續議列國歲計政要敘〉中指出，二千年來中國的民史「幾絕」，凡正史，編年、傳記、紀事本末、詔令奏議各類舊史，「不過爲一代之主做譜牒……至求其內政之張弛，民俗之優絀，所謂寢強寢弱與何以強弱之故，幾靡得而睹焉。……是故君史之蔽極于今日。」(註9)1897年到1898年嚴復譯述斯賓賽(H. Spencer)的《社會學研究》第一篇《論群學不可緩》，他批評舊史體例：「于君公帝王之事，則雖小而必書，于民生風俗之端，則雖大而不載，是故以一群強弱盛衰之故，終無可稽。」(註10)1899年羅振玉在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翻印本序中說：以進化論觀點衡量中國舊史，「唯司馬子長氏近之，此外二十余代載籍如海，欲借以知一時之政治風俗學術，比諸石層千仞，所存殭石不過一

註8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一冊)，(台北：臺灣中華書局，民國七十二年)，頁70。

註9 同前註，《飲冰室文集》(第二冊)，頁60。

註10 轉引自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頁175。

二，其他卷帙紛論，只爲帝王將相狀事實作譜系。」(註 11)

上述的批判反映了傳統中國史學的內容已經無法提供急劇世變下的國民做借鏡了，但一直要到戊戌變法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廣泛涉獵西學後，建構新史學的努力和觀點才逐漸形成。從 1899—1904 梁啟超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所發表介紹西方思想家盧梭、達爾文，斯賓塞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構思新史學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響。他推崇社會進化論，有關史學理論也受到日本學者浮田民和的《史學通論》和坪井久馬三《史學研究法》的影響。1901 年發表在《清議報》的〈中國史敘論〉以及 1902 年的〈新史學〉是梁啟超對新史學觀點較具體而有系統的闡述。也是日後新史學的奠基。

〈新史學〉一文開始對中國舊史的缺失有更深刻的歸納，梁啟超認爲舊史學的病源有四蔽：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是「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是「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是「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所以歷來「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註 12)舊史內容既然是跳脫不出朝廷、個人、陳跡、事實之窠臼，而無益於啓發民智，新史的內容就應強調國家、群體、今務和理想（即歷史之精神）。因此緊接著定義歷史的界說時，梁啟超就開宗明義地揭示：「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註 13)他認爲人群才是歷史的主體，人類是進化之極則，全體人類進步的現象又幫助了後來人群之日益進步，「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註 14)爲了從前人進化現象中獲益，以利後世之再進步，探討其中的「公理公例」是重要

註 11 同前註，頁 176。

註 12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民國八十三年)，頁 47。

註 13 同前註，頁 13。

註 14 同前註，頁 5。

的方法。一人一姓的進步絕不足師法，必須是「探索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的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註 15)由此可見，新史學的歷史觀點是要以社會群體，以國民之活動為本位來取代過去君王朝廷為本位的史學。另外歷史敘述的重點的「進化之現象」，後世孩童能知道周公，孔子，柏拉圖所不知之理是因為「食群之福，享群之利，藉群力之相接、相較、相爭、相師……而智慧進焉，而才力進焉，而道德進焉。」(註 16)因為有人群進化記錄之存留，人類的精益求精才變成可能，這也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進化論所強調的。

中國的舊史學除了帝王家譜的內涵受到批判之外，撰寫的方式也被梁啟超指稱有二病：一是「能鋪敘而不能別裁」，二是「能因襲而不能創作」。(註 17)因為舊史學有著四蔽二病遂又遺留給讀者三大惡果：「難讀」，「難別擇」與「無感觸」。(註 18)為了讓史學撰著能成為新時代「國民之明鏡」，喚起愛國精神的法門，建立一種新觀點、新體裁，新文體的撰述體例是有必要的。在 1921 年、1926 年發表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中，梁啟超更有系統而具體地歸納撰史的方法，從史料的搜集，鑑別和剪裁，史事的分析討論，到史文的排列，文采要「簡潔」、「飛動」，(註 19)都有其獨到見解，新史學的理念也就更加完備明確了。

當時社會上學者對梁啟超的觀點所產生的回應與共鳴漸漸形成新史學的思潮，在批判舊史學方面，馬君武在《法蘭西近世史》譯本序文中沈痛地說：「吾中國四千年，乃有朝廷而無國家，有君譜而無歷史，有虐政而無義務，至于今日。」(註 20)黃炎培更指出二十四史于「興盛成敗之跡，聒聒千萬言不能盡，乃于文化之進退，民氣之開塞，實業之衰

註 15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三冊)，頁 1。

註 16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 12。

註 17 同前註，頁 8。

註 18 同前註，頁 9。

註 19 同前註，頁 206-209。

註 20 轉引自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頁 177。

旺，概乎弗之道也。」「恫哉！我國無史！」(註 21)在撰寫新體裁史著方面，梁啟超寫〈李鴻章〉、〈王荊公〉、〈袁世凱〉的人物傳記採用了章節體裁，並對歷史人物加以評價，希望藉改革家的傳略為荊公「洗冤」，為商鞅「訟直」，為管子「傳真」。(註 22)1912 年何炳松翻譯了美國歷史學者魯賓遜(J. H. Robinson)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等其他著作。夏曾佑也在 1904—1906 年撰寫了新體例的通史《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採用編、章、節體例，強調以進化史觀為指導，對文化、宗教的論述較為詳盡精闢。(註 23)五四運動之後，平民文學的興盛也帶動了通俗史學的普及，白話文的通俗史學著作，以及演義體例的歷史通俗讀物也大量出現。1920 年呂思勉出版了《白話本國史》，雖然是新學制的高中教科書，卻也普及為一般青年自修的歷史讀物。新史學的理念在此時已從史學抽象的理論逐漸落實到更新歷史著作的撰寫，更推展到歷史知識的普及了。

總之，新史學在觀點上主張以西方進化論歷史觀為指導，反對復古倒退，停滯不變或一治一亂循環不已的傳統舊史觀，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都重新加以評價，「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贊歎舞蹈，頑廉儒立，刺激其精神血淚，以養成活氣之人物。」(註 24)在內容上要求突破封建史學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和政治史為基礎的狹隘格局，把研究的範圍擴展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層面，如學術、藝術、宗教、風俗等。在方法上要能實破傳統史學方法的束縛，充分吸收考古、地理、語言、政治、社會、經濟學的現代研究成果和方法。在史著的撰寫上，力求創新易讀，拋棄承襲舊史體裁。(註 25)由於這些新觀點的提出，落實到史學的研究後，近代西方史學理論的介紹和研究更豐富，新體裁的中國通史的寫作

註 21 同前註，頁 177。

註 22 馬金科，洪京陵編著，《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頁 186。

註 23 同前註，頁 191。

註 24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 36。

註 25 胡逢祥，張文建著，《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頁 178-183。

和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也有更多學者投入心力，史學的領域更開拓，史學的應用普及與經世目的都更被強調了。

參、張蔭麟的通史方法論

一、學術生涯

張蔭麟（1905—1942），自號素癡，廣東省東莞縣人，幼年事蹟很少有資料可稽，但從十六歲（1921）進入清華學堂起，不只在學業上精進，才名也漸嶄露。在他短暫的學術生涯中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1921年至1929年是清華求學時期

張蔭麟十九歲時即在《學衡》雜誌發表〈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一文，批判梁啟超考証之失誤，《學衡》編者竟然誤認為出自國學教授之手。（註 26）張蔭麟的勤學也可以從他在《清華學報》所寫的〈撰著提要〉窺見一般，〈撰著提要〉是從清華圖書館的中外雜誌中選取各學科較有價值之論文，由校內同學摘錄精華以供閱讀，從第一卷第一期到第三卷二期張蔭麟共撰寫了 63 篇，佔總數的 64%（而撰寫次多的作者不過寫了九篇），涉獵的內容則以史學最多。（註 27）另外，就所發表的重要論文也有 12 篇之多，（註 28）最重要的當屬〈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其中談到史料的兩類別以及十五種局限，（註 29）並提出設立「歷史訪員制」，以科學方法觀察記錄當代人類的活動，希望能減輕

註 26 李毓澍編，《張蔭麟先生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頁 32。

註 27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年，頁 27-31。

註 28 同前註，頁 25-26。

註 29 張蔭麟，《文集》，頁 1062-1081。

過去歷史記錄所有的絕對限制。(註 30)

(二)、1929 年秋天到 1933 年夏天是留學美國時期

張蔭麟在史丹福大學先是攻讀西洋哲學，後又改讀社會學，「從哲學冀得超放之博觀與方法之自覺，從社會學冀明人事之理法。」(註 31)但另一方面他卻表明以國史為志業。此時因課業繁重，專門論述較少，但因國內九一八事變爆發，使他也發表對局勢關切的時論文章。由於哲學的訓練，此期間最重要的作品是〈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批評以前歷史法則的大觀點，即目的史觀，循環史觀，辯證史觀，演化史觀，文化變遷的因果律。(註 32)值得注意的是，張蔭麟表現出對循環史觀的深厚偏愛，不承認歷史進步現象，這與當時中國史學界推崇進化論的趨勢大異其趣。他甚至指出中國文學史上有兩種思潮交互循環，即「詩言志」與「文以載道」，但後世已有學者指出其失誤，因為言志載道並非文學史上的兩派，無從證明循環史觀的正確。(註 33)

(三)、1933 年至 1937 年是任教清華時期

他主要擔任「中國學術史」與「宋史」等課程，因此發表之論文也以有關宋史（七篇）和近代史（七篇）為最多。(註 34)此時張蔭麟對政治和社會的批判也展現了很大的熱情與現代思想，例如他批評中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三諱主義」與大家庭的父權中心是阻礙民族前途的兩大障礙物。(註 35)此外，由於接受國防設計委員會與教育部編寫教科書，張蔭麟也開始關切通史的撰寫與教科書問題，在《關於

註 30 同前註，頁 1084。

註 31 同前註，頁 5。

註 32 張蔭麟，《文集》，頁 1088-1108。

註 33 李洪岩，〈論張蔭麟及其新史學〉，收錄於《歷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2：7），頁 83。

註 34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頁 79。

註 35 張蔭麟，《文集》，頁 343-353。

「歷史學家的當前責任」》一文中提出「改良歷史課本乃改良歷史教育的先決問題。」(註 36)

(四)、1937 年至 1942 年十月是任教西南與流亡時期

這段期間張蔭麟先後任教於浙江大學、西南聯大，輾轉停留浙江、東莞與遵義。1941 年與張其昀等人創辦「思想與時代」月刊，也計劃編纂發行「國史長編叢書」，可惜 1942 年因慢性腎臟炎病逝，壯志未酬。此時張蔭麟的著作多方面地顯現較成熟的史學研究成果，宋史的論文有十一篇，(註 37)《中國上古史綱》的出版具體表達了他對撰寫通史的理念，特別是自序長達五千六百餘言，提出了筆削的五大標準：新異性、實效性、文化價值、訓誨功用，以及現狀淵源的標準，也說明史家貫穿複雜史實的四大範疇：因果、定向發展、演化發展、與矛盾發展的範疇。(註 38)另外，〈論史實之選擇與綜合〉一文是他從事歷史編纂工作時經驗總結，後人認為這是「他晚年最精湛的理論著作，也是精研史學原理一生的心血結晶。」(註 39)綜觀張蔭麟的學術生涯，悠遊史學領域中，對於科技史、宋史、考據學、歷史哲學都深有造詣，又鍾情於國史為志業，其對通史的研究與思考當更見深刻。

二、通史方法論

清末新史學思潮醞釀以來，對國史的關注與對歷史教科書的編纂都已蔚為風潮。有關新通史撰寫，章太炎首先在其《哀清史》一文後附有〈中國通史略例〉及〈中國通史目錄〉，提出新通史體例為：以「典」記制度，「記」述人事，「考紀」「別錄」以備知來，「表」代紀傳。

註 36 李洪岩，〈論張蔭麟及其新史學〉，頁 85。

註 37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頁 121。

註 38 張蔭麟，〈文集〉，頁 11-17。

註 39 李洪岩，〈論張蔭麟及其新史學〉，頁 87。

(註 40)繼之而起的梁啟超則以更多的篇幅文字來鋪陳他的通史架構：〈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是他為撰寫中國通史的準備和根據，《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義及其範圍〉，以及〈國史研究六篇〉附錄〈原擬中國通史目錄〉，〈原擬中國文化史目錄〉中討論了通史的體例內容立場。另外何炳松於 1928 年的《通史新義》，熊十力的《中國歷史講話》中都提到了通史體例的意見。

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張蔭麟對中國通史的撰寫深感關切毋寧是很自然的事。他對通史撰寫的理念除了從〈中國史綱上冊自序〉可以看到較為完整的脈絡之外，對編寫高中教科書和國史長編的原則都可以視為他的通史方法理念的一部份。(註 41)以下從四方面來探討：

(一)、編撰國史長編：

早在民國 22 年張蔭麟寫信給張其昀時，就提到其廣徵博通之構想：

通史艱鉅之業，絕非少數人之力所克負荷，斷制營構，固須自用匠心。至若網羅散佚，分析史材，及各方面之綜，則非資眾手不可。頗擬約集同志，先成一國史長編，此非徒為少數人謀。後來任何有志通史者，均可用為資藉。此長編不必有一貫之統系，各冊自成段落，為一事、一人、一制度、一時代或文化一方面之專史可，為叢雜之論集亦可。篇幅多寡亦可不拘，要以於國史智識新貢獻者為準。各冊隨得隨刊，不必按倫類或時次編排。此意非弟創發，英國 Began Paul 書店所刊有名之「文化史叢書」性質即略如上所云云。此叢書曾擬百冊，至今尚未完，終於文化史貢獻甚鉅。(註 42)

註 40 金靜庵，《中國史學史》(台北：國史研究室，民國六十一年)，頁 304。

註 41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頁 317。

註 42 張蔭麟，《文集》，頁 1127。

註 42 同前註，頁 13-17。

由此可見，張蔭麟對新通史的體例傾向長編的作法，不拘泥於固定的體例形式，但是求其涵蓋廣泛，且對增長國民智識有貢獻。這些構思有來自外國的啟發，也反映當時新史學編纂民史，重視文化與供國民借鏡的色彩。雖然並非獨創發明，卻帶動了張蔭麟進一步深思如此龐大艱鉅工作的實際完成。

(二)、史事剪裁標準：

通史既非一人獨力可完成，內容又需涵蓋龐雜的史事、人物制度、文化各面的專題，如何從幾千年汗牛充棟的史料中淘沙撿金，俾使對國史有新貢獻？張蔭麟在〈中國史綱上冊自序〉中具體談到他剪裁史事的標準：(a).新異性標準：新異性即史事內容的特殊性，史事愈新異愈重要，「理想是要顯出全社會的變化所經諸階段和每一階段之新異面貌和新異的精神。」(註 43)(b).實效性標準：所謂實效性是「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群的苦樂」，其牽涉和影響愈大則愈重要。(c).文化價值標準：所謂文化價值是真與美的價值，因文化價值的觀念隨時代改變，隨史家因此有見仁見智的不同。(d).訓誨標準：訓誨功用是指完善的模範或是成敗得失的鑑誡。張蔭麟主張應該放棄的，這並非成敗得失的鑑戒不重要，而是基於學術分工理由，可以把眾多方面的誠鏡分別應用在不同的領域中，如領袖學等範圍。(e).現狀淵源標準：「史事和現狀發生學的關係愈深，愈有助於現狀的解釋，則愈重要，故史家每以詳近略遠為旨」。(註 44)

整體而言，張蔭麟認為寫通史的人除了第四種標準之外，其他的標準都應該自覺地，嚴格地，合併採用。

(三)、統貫歷史繁雜的範疇：

當史實剪裁挑選後，紛雜的史事如何組織？大致不出四個範疇：(a).

註 43 同前註，頁 13。

註 44 同前註，頁 13-15。

因果範疇：歷史中的因果關係是特殊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一種關係，歷史的事實因其內容的特殊性是不能復現的。(註 45)(b).定向發展範疇：歷史的變化階段互相適應，並循一定的方向，趨於一定的鵠的。(c).演化發展範疇：歷史發展所經歷的任何兩階段相近似，但起始與結束的階段又極大不同，有愈趨進化，也有愈趨退化的。(d).矛盾發展的範疇：指變化過程中矛盾的兩個元素在組織內部衝突、消納於新產生的組織中。上述四個範疇理當兼用，但有時仍難避免歷史發展的偶然。(註 46)

綜合而言，歷史的事實中並無一定的因果關係，史家組織統合史事也就必須注意史事發展中的演化方向，並且盡量避免歷史認識上的偶然。

(四)、歷史教科書編撰原則：

新史學對舊史體例的批判也帶來對現有歷史教科書的不滿與編寫新教科書的嘗試。張蔭麟也有感於當時的年青人往往「被強迫重溫再溫可厭倦的一套相同的、雜湊的、機械的史實。而且人名地名數量之多，也使人疲於記憶，懶於翻讀」。(註 47)因此，1935 年接受國防設計委員會之委聘而編寫高中歷史教科書時就擬定計畫寫三套，分別針對小學，初中，高中的學生而有不同的編撰寫法：「第一套以人為主，故事式的寫法，選擇每一時代的代表性的人物，例如孔子，秦始皇、唐玄奘、孫中山等人物，附帶的烘托這時代的大事。第二套是縱剖面的，以事為主，大者如政權，如軍隊，如教育，如人民生活；小者如衣食住行，要源源本本具體說出了每一所涉及的事物的衍變，發展，是人的生活的歷史，進步的歷史。第三套是橫剖面的，以時為主。從橫的方面去看這一時代，去看這一時代的各方面。該注意的這橫剖面並不依據舊的王朝起迄

註 45 同前註，頁 15。

註 46 同前註，頁 16。

註 47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頁 313。

來劃分，而是依據歷史發展的具體階段。」(註 48)

這套計畫不但顧及了學生成長的理解因素，也考慮到內容不疊層架屋，而且漸次呈現出史事豐富的內涵，使人物、事件、和時勢交融。在其中關照到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事物的發展與進步的歷史，特別以歷史發展的具體階段(如秦始皇建立封建專制政權，鴉片戰爭)作為時勢橫剖面的依據，更顯出揚棄舊史體例的作風。這些都充份表達了新史學所強調的新國史要素。

此外，張蔭麟還提出貫穿這三套書的共通原則是「求其可讀，文字和內容都要通俗生動能夠吸引讀者，使之愈讀愈有味，才算合於標準。」(註 49)這樣看重歷史的生動、可讀性在吳晗回憶與張蔭麟合作編寫教科書的過程中也曾提到，編寫工作的最後步驟是「就長編貫通融會，去其重複祗牾，不重考證，不引原文，盡量減少人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筆，畫出四千年來動的歷史，目的在使此書可讀，使人人能讀此書，不但熟習國史，而且能有一個客觀的看法。」(註 50)

綜觀而言，張蔭麟的通史方法論有抽象理論的建構嘗試(包括史事的剪裁與組織原則)，也有具體撰寫的計劃大綱，而且比起其他新史學研究者更進一步將理論付諸實現，《中國上古史綱》因此而出版。

肆、《中國上古史綱》的內容分析

《中國上古史綱》是 1935 年張蔭麟接受國防設計委員會之委託而編寫的高中史教科書，因為蘆溝橋事變的爆發，全部稿件淪陷在北平，後經吳晗搜集曾發表在報章雜誌上的十多篇文稿加以抄錄整理，1941 年才由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正式出版。換言之，這本書的編寫在中日戰爭前兩年已展開，卻一直到戰爭爆發後近三年才出版。此期間民族遭

註 48 吳晗，《史事與人物》，轉引自黎華趙，《張蔭麟研究》，頁 327-328。

註 49 同前註，頁 314。

註 50 同前註，頁 314。

逢存亡危急之秋，過去新史學的研究工作被迫停頓，張蔭麟認為不論就中國歷史或是史學發展來說都處於一個分水嶺的頂峰，回顧或前瞻全民族的歷史正是最好時機。他的目的是結集過去新史學的研究成果，「寫出一部份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註 51)這是民國二十九年張蔭麟在昆明為《中國上古史綱》寫自序時的自我期許，他對國家與史學的危機深有體認，言詞之間卻流露著無限的希望與使命感，欲藉此教科書幫助大轉變時期的人們了解自己民族之歷史。這點與梁啟超認為歷史的目的是「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鑑。」(註 52)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關實際撰寫的技巧上，張蔭麟在初版自序中也揭舉了三大目標：

- (一)、融會前人研究成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參入考證，不引用或採用前人敘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載錄亦力求節省；
- (二)、選擇少數的節目為主題，給每一所撰的節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的涉及以為背景；
- (三)、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要人物的性格，兼顧並詳。(註 53)

這三項目標基本上就是張蔭麟的通史方法論的延伸與實際應用，只是所懸鵲的與實際成就之間究竟有多少距離是有待更深入探析的，下面就兩大部份加以探討。

一、外部分析

目前所見之《中國上古史綱》大致都是十二章之篇幅，共計五十七節，第十二章因為是未完成稿，故未分節目。就外部結構來看，探討政權更迭與戰亂的有廿六節，社會組織文化變遷的有十二節，人物素描的

註 51 張蔭麟，《文集》，頁 10。

註 52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頁 184。

註 53 張蔭麟，《文集》，頁 19。

有十二節，學術思想的有三節，另外專論經濟的有二節，外族有二節。單就主題的分配而言(不計算文學敘述篇幅的長短)，朝代政權的替換與戰亂仍是本書的重心所在，這固然是因政權更換對歷史脈絡的發展有重大影響，或許也因為過去所存留的政治史料最為豐富所致。僅次於政治變遷而佔相當多篇幅的是社會組織變遷和人物性格的鋪陳，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是作者起初編撰時就有的構想，即「這部中國史的著眼點在社會組織的變遷，思想和文物的創闢以及偉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動。」(註 54)另一方面其實也反映了新史學思潮以來的撰述趨勢——打破帝王將相中心的狹隘格局，擴展歷史及於「國民全部的經歷」，包括宗教、文化、學術、經濟等範圍。所挑選介紹的歷史人物也不再局限豪族重臣，其實也代表對歷史人物的重新評價。

二、內部分析

(一)、以商代為上古開端：

《中國上古史綱》的第一章第一節標題為商代文化，夏商大事及以前的傳說列入第二節，並在文中提到：「我們若從夏朝再往上溯，則見歷史的線索迷失於離奇的神化和理想化的傳說中不可析辨了。」(註 55)張蔭麟這樣明白表達將夏以前的事蹟視為神話傳說，而把商代視為中國信史開端的立場，顯然是深受疑古派之說的影響。民國二、三十年代的疑古風潮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編寫，「古史辨運動」興起之前，上古史大多從黃帝開始寫起(如章鉞的《中華通史》)，疑古之風興起後則多從夏朝寫起(如周谷城的《中國通史》)，更有激烈疑古的學者直接以商朝為開端，張蔭麟就是一個例子。(註 56)再者，張蔭麟一開始就以文化為題，分敘了商朝人民的魚獵、畜牧、飲食、居室、工藝、姓氏等生活

註 54 同前註，頁 23。

註 55 同前註，頁 35。

註 56 賴福順，〈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材之研討〉，中華民國史第四屆討論會論文，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頁 9-10。

習俗，也是與新史學擴展歷史範圍及於庶民全體生活的理念相呼應。因此，本書的第一章第一節主題除了反映新史學思潮中的疑古、科學求真、重視民史的精神外，也同時是張蔭麟應用其新異性標準的最好證明。

(二)、專節專章特寫歷史人物：

張蔭麟在書中特別選取了一些時代人物採用專節，甚至專章的篇幅來討論，這與許多教科書中人物只是敘述史事時附帶出現的配角方式大為不同。被列入專節討論的人物有鄭子產（第三章第五節）魏文侯、李克、吳起（第五章第二節）；墨子（第六章第二節）；孟子、許行、及《周官》作者（第六章第四節）；楊朱、陳仲、莊周、惠施、老子（第六章第五節）；鄒衍、荀卿、韓非（第六章第六節）；以及呂不韋與嬴政（第七章第一節）。書中第四章更以長達二十二頁的篇幅介紹孔子人格與時世。這些人物將相王公不多，反而是對社會制度的建立或思想有重大影響的人較多，可以看出張蔭麟應用了實效性標準（直接或間接影響人群苦樂的多寡）與文化價值標準（真與美的價值，並反映時代）作為選取史事與人物的依據。

張蔭麟特寫這些人物的方式也有匠心獨運之處，例如《中國上古史綱》共有十二章，其中春秋時代佔了兩章（第三章霸國與霸業，第四章孔子及其時世），除了爭霸事蹟，主要討論的人物就是鄭國子產與孔子。春秋亂世，人才濟濟，作者卻單以子產與孔子為焦點必有深意。他在春秋霸業之後，另立第三章第五節寫子產並加上「鄭」字，用來突顯小國在大國爭霸中的求存爭扎，使讀者對局勢有全面性了解。（註 57）對於孔子在教育史上的開創之功與儒家宗師對後世的影響這樣重大的人物，張蔭麟寫了二十二頁，的確給予「相當透徹的敘述」，也看出對孔子極高的評價。

註 57 李埏，〈張蔭麟先生傳〉，《史學史研究》1993 年第三期，頁 37。

(三)、擅長用語體文說故事的方式：

全書中幾乎每一個人物和事件的呈現都是故事，引人入勝，詳盡鋪敘卻不嫌累贅，亦不失之粗略。以鄭國公孫僑(子產)為例，張蔭麟在一專節中列舉了十一個小故事來表現子產在內政措施，外交和戰中處事的機智與堅忍性格。爲了充實國力，他制定「刑書」，增加軍賦，引來人民咒罵他如蛇蠍，但子產說：「苟有利於國家，生死不改。」(頁 98)他臨死前對繼任者的忠告是：「惟獨非常有德的才能靠寬縱服人，其次莫如用猛力。你看火，因爲他猛烈，人人望見就怕它，故此因它致死的很少，但水因爲軟弱，人人都去狎玩它，故此因它致死的很多。」(頁 99)對於鄭子產的評價，張蔭麟引證了當時人的觀點，而不是加上作者自己的評斷：

子產從政一年後，人民唱道：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到了三年，人民唱道：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頁 97)

張蔭麟就在如此簡短的舉証、平實的敘述文筆中傳達了他對子產的敬意，也讓讀者同感歷史前哲的智慧。

(四)、擅長摘引史料以為旁證：

張蔭麟常會在行文中舉用精短而寫實的史料導引讀者進入歷史情境，例如以《詩經·小雅》中的〈采薇〉詩歌來反映周代出征戍獠將士的情懷(頁 43)，引用李白的〈古風〉詩之一來素描秦始皇，因爲「這首壯麗的詩是一個掀天揭地的巨靈的最好速寫。」(頁 171)又以一首〈七月〉民歌來看周代農民的生活起居。(頁 32)其他被引用的史料還包括殷墟甲骨文，西周銅器上的銘文，記功石刻文，楚辭等文獻。由此可見張蔭麟充份運用了民國以來考古的新發掘史料，也表現了史料學派求真，文必有所依據的精神。

(五)、文詞流暢優美，夾敘夾議：

爲了使教科書生動通俗具有可讀性，張蔭麟在語體文的敘述中仍保有古文的典雅與簡潔。有時只用一句話就總結了全段的鋪陳，例如「教育是孔子心愛的職業，政治是他的抱負，淑世是他的理想。」(頁105)「孔子是傳統制度的擁護者，而墨子則是一種新社會秩序的追求者。」(頁148)他介紹《老子》書中複雜抽象的道學也是平易可親：「教人謙卑遜讓，知足寡欲；教人創造而不佔有，成功而不自居；教人將取先與，以退爲進，以柔制剛，以弱勝強。」(頁164)至於描寫墨子則說他「拿理智的明燈向人世作澈底的探照。」(頁149)墨子對亂世的質疑在張蔭麟流暢文筆下也很能引人深思：「爲什麼殘殺一個人是死罪，在侵略的戰爭中殘殺成千上萬的人卻被獎賞，甚至受歌頌？爲什麼攘奪別人的珠玉以至雞犬的叫作盜賊，而攘奪別人的城邑國家卻叫作元勳？」(頁149)《中國上古史綱》的第三章第一節是描寫楚國的興起，作者談到由於江漢流域的土壤肥美，使楚人生活充滿悠游閒適，擁有北方人所羨慕的經濟安全感，因此「楚人的神話裏，沒有人面虎牙，遍身白毛，手執斧鉞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著荷衣，繫著蕙帶，張著孔雀蓋和翡翠伶的司命(主持命運的神)。適宜於楚國的神祇的不是牛羊犬豕的羶腥，而是蕙肴蘭藉和桂酒椒漿的芳烈；不是蒼髯皓首的祝史，而是彩衣姣服的巫女。」(頁81-82)

綜觀《中國上古史綱》全書，不論是主題的選定，史事的剪裁，節次的安排，文采的敘述處處都有作者精心的思考蘊藏其中。對照本文第三節，可以看出張蔭麟應用他的通史方法論作爲指導原則的努力。在選擇少數節目爲主題方面，他適切巧妙地融入新異性標準，實效性標準與文化價值標準。他以全書最大一章的篇幅討論西周社會，因爲「這個時期是我國社會史中第一個有詳情可考的時期，周代的社會組織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史的基礎。」(頁49)他又以專章來陳述孔子人格與時世，因爲「孔子給春秋時代以光彩的結束。」(頁148)這些人物與時代交錯的處理正是他主張編寫高中教科書的重點——以時代爲主，綜述人物、事

件，並且強調歷史發展的階段。在歷史撰寫方面，文字的優美和富於想像更是最常被讚美的特色，張蔭麟撰寫教科書確實做到「通俗生動能夠吸引讀者，使之愈讀愈有味。」

伍、結語

清末民初以來的新史學思潮除了批判舊史體例與內容，更致力於建構新史觀，撰寫新歷史書。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平民文學帶動了歷史知識走向實用化、通俗化，許多教科書與歷史讀物紛紛應時而出，《中國上古史綱》也是在如此背景下出版。比較不同的是張蔭麟嘗試應用自己建構的通史剪裁、組織方法，實際編寫歷史教科書。通史範圍廣，取材、撰寫都不容易，因此顧頡剛才會批評：「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編著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條列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為變相的《綱鑑輯覽》或《綱鑑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註 58)《中國上古史綱》的出版卻得到許多的讚譽，顧頡剛認為這本書「不加腳注，不引原文，使有井水處，人人皆熟於史事。」(註 59)傅斯年的評語最簡潔：「能動人，文章好，而題目不多，說的透徹。」(註 60)日後李毓澍編纂文集時也說：「不論史實的取捨，史量的裁量，史文的清新典雅，在在都顯示著張先生深厚的造詣和洋溢的才華。……序言中透露著他對重寫符合時代需要的國史的抱負，敘事的字裏行間更閃耀著他熾熱的愛國情操。」(註 61)由此可見這本書所受之推崇。

但是另一方面，對照作者自己所定之理想目標，《中國上古史綱》仍有其美中不足之處。就題材而言，對信史以前之文化、民族起源問題

註 58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頁 85。

註 59 同前註，頁 86。

註 60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六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64)，頁 134。

註 61 李毓澍，〈編者綴言〉，《文集》，頁 1277。

略而不談；經濟史的討論太貧乏以致對社會經濟史的注意不足。(註 62) 撰寫方面，張蔭麟希望「原始文件的載錄亦力求節省」，但書中引用原始資料的篇幅仍然不少，「計引文在三百字以上者有十三處之多，其最長者多達四百八十一字。」(註 63)此外，作為一本高中教科書，《中國上古史綱》篇幅顯得稍長，僅僅敘述東漢以前的歷史就寫了二百四十六頁，其中有關戰爭的描述部份往往失之冗長，例如寫班超平定西域，全段共四十三行，不分段落(頁 265-267)，讀來細緻卻難免有繁雜之感。

大體而言，《中國上古史綱》所呈現的體例內容大多切合張蔭麟對自己所揭示的通史撰寫原則，也充份反映了新史學思潮對他的影響，他的努力實踐理論是明顯可見的。面對浩瀚史事，取材排比很難不顧此失彼，何況又要兼顧生動易讀，下筆行文確實要煞費苦思。或許最遺憾的是他「不壽而終」，未能完成全套的撰寫計劃，以致於不能更完整呈現他的理論全貌。雖然在撰寫通史的實際成就與他自己標舉的鵠的之間仍然存在一段距離，但是張蔭麟至少已在新史學的領域中樹立了身體力行、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示範。

註 62 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六期，民國六十七年，頁 480。

註 63 同前註，頁 480。

陸、徵引書目

- 方 豪，〈略論張蔭麟先生史學上之成就〉，《書目季刊》十三卷四期，民國六十九年三月。
- 李洪岩，〈歷史學也是一門藝術——評張蔭麟的一個史學觀點〉，收錄於《歷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1：7），頁 76-89。
- 洪 岩，〈論張蔭麟及其新史學〉，《歷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2：1），頁 85-90。
- 汪榮祖，〈梁啟超新史學試論〉，收錄於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 955-968。
- 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收錄於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 371-428。
- 沈剛伯，〈史學與世變〉，收錄於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 1109-1120。
- 李毓澍編，《張蔭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
- 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六期，民國六十七年。
- 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 馬金科，洪京陵編著，《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 許冠三，《新史學史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
-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一冊），台北：臺灣中華書局，民國七十二年，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民國八十三年）。
-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年。
-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三年。